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理变迁

方丽萍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关键词:牡丹;中唐;晚唐;文化心理;发展变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1)01-0032-06

宋后,“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周敦颐《爱莲说》)基本成为常识,当代学者也均以此为前提进行有关研究。^①但因为未能从时间维度、从牡丹欣赏者的身份区别等方面对此进行宏观把握,可能多少会有一些缺失。

一、牡丹爱好者主体的时代变化

《松窗杂录》:“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

《开元天宝遗事》:“杨国忠初因贵妃宠专,上赐以木芍药数本,植于家。”(百宝栏条)

“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即西河郡)众香寺,得白牡丹一株,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1]185}“至德中,马仆射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者,移于城中”。^{[1]185}

唐时牡丹出武后家乡西河,高宗时才移至京城。初盛唐时基本只限于宫廷种植。初盛唐诗人只有王维和李白提到牡丹,还未能形成普遍的社会风尚。

“贞元中牡丹已贵”。^{[1]283}李肇也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2]45}李肇生活于大和年间,三十余年前刚好是贞元时期。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

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刘禹锡永贞元年被贬离开长安,此诗只能作于贞元间,而白居易新乐府的创作集中在元和四年前后为左拾遗时。这可以进一步说明追赏牡丹的高潮在贞元末至元和初。

“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览者。”^[3]贞元前后,牡丹被热捧,价格飙升,“一束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居易《牡丹芳》),“王侯家为牡丹贫”(王建《闲说》)的现象产生。

对牡丹的狂热追捧很快导致了牡丹栽种的普及,“元和初犹少,今与戎葵角多少矣”。^{[1]185}段成式生活的大和年间,那时是“豪家旧宅无人住,空见朱门锁牡丹”(朱庆余《登玄都阁》)。

鱼玄机有《卖残牡丹》诗:

临风兴叹落花频,芳意潜消又一春。应
为价高人不问,却缘香甚蝶难亲。红英只称
生宫里,翠叶那堪染路尘。及至移根上林苑,
王孙方恨买无因。

鱼玄机借牡丹自伤身世,但也由此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晚唐时,牡丹已成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旧时王谢堂前燕”,由中唐时高贵者的专属沦落为普通大众的欣赏物。“但是豪家重牡丹”(徐铉《严相公宅牡丹》)的景象已经过去,穷愁潦倒、官卑人微的士人,如张祜、

收稿日期:2009-12-04

作者简介:方丽萍(1966-),女,湖南南县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E-mail:fanglip@126.com

① 主要有李树桐《唐人喜爱牡丹考》(黄约瑟主编《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三秦出版社,1989年);翁俊雄《唐代牡丹》(《唐研究》第五期);郭绍林《〈增订注释全唐诗〉处理牡丹诗所存在的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刘航《牡丹:唐代社会文化心理变迁的一面镜子》(《学术月刊》2005年第12期)等文章。

孙鲂等也加入了牡丹欣赏者行列。“由来不是求名者，唯待春风看牡丹”（张祜《京城寓怀》），昔日代表荣华富贵的牡丹此刻成了清高自持的代名词。此中的变化不由不令人深思。

二、中唐：“牡丹热”中士人的立场——“京城贵游尚牡丹”辨

唐代的长安一派花团锦簇，“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鞞，并簪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则驻马而饮”。^[4]牡丹的盛开引来无数的观赏者，“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库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白居易《牡丹芳》）。牡丹的欣赏者可谓多矣，欣赏牡丹的场面也可谓壮丽矣。

纷纷的看客里，所看皆同，看到的却各异。诗人与“京城贵游”的心态悬若霄壤：

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卢纶《裴给事宅白牡丹》）

暮春三月，深色牡丹花旁，人潮如涌、闹闹嚷嚷，裴给事宅中的白牡丹旁却没有赏客。此诗明显有所寄托：那些不同流俗的士子们也如白牡丹一样，美好的品质无人欣赏，满腹的才华和抱负无处施展，只有寂寞开放、悄然凋落。赞美、欣赏时俗的对立面，显然包含了对时俗的批判。

下面这首诗更是出语惊人：

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不校多。（柳浑《牡丹》）

戎葵即蜀葵，也叫一丈红，常见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和牡丹的珍贵、华丽、纵恣、繁缛相比，戎葵就象田野里穿蓝布小褂的农家少女。在大家都以贵妇人的天鹅绒曳地长裙为美的时代，说粗蓝布小褂和天鹅绒长裙差不多，显然是故意在和流行捣乱。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捣乱的还不止柳浑一人。武元衡也将蜀葵和牡丹对比，得出的结论是蜀葵更可爱。

文士对“牡丹热”的批判于下诗亦可见一斑：

骑马傍闲坊，新衣著雨香。桃花红粉醉，柳树白云狂。不觉愁春去，何曾得日长。牡丹相次发，城里又须忙。（王建《长安春游》）

王建走的是一条僻静的坊路，空气中的花香熏香了细雨，雨又飘然落到轻薄的春衫上。任马信步，马上的人在风景里沉醉，立刻又忧伤于春天的即将过去。暮春时，艳丽、张狂的牡丹花就要开了，城里的那些个喜爱牡丹的人们又要如潮水般涌出，在城市四处喧哗吵闹，夸耀他们的财富。那样的人、那样的风景多么令人厌恶啊！

王建特别反感那些牡丹追捧者，他甚至直接将牡丹比作狭邪，对长安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世间娶容非娶妇，中庭牡丹胜松树。九衢大道人不行，走马奔车逐斜路。斜路行熟直路荒，东西岂是横太行。南楼弹弦北户舞，行人到此多回徨。头白如丝面如茧，亦学少年行不返。纵令自解思故乡，轮折蹄穿白日晚。谁将古曲换斜音，回取行人斜路心。（《斜路行》）

乐府《相和歌辞·清商曲》中有《长安有狭邪行》。“狭邪”本指妓女、妓院，陆机曾有同名诗作，表现的是“世路险狭邪僻，正直之士无所措手足”的主题。王建此诗用意与陆诗一致。诗歌开头他就给出了两组概念：美貌——妻子，牡丹——松树。用牡丹和松树对比，意味本已深长，又用在当时已被誉为“国色天香”、倍受帝王喜爱和“贵游”追捧的牡丹来代指狭邪，其趣味显然与牡丹的追捧者有天渊之别。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唐人重牡丹”。

其实，关于唐人是否“重牡丹”的问题，宋人意见就不一致。《容斋随笔》卷二“唐重牡丹”条云：

欧阳公《牡丹释名》云：“牡丹初不载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内《买花》一章凡百言，……元微之有《入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和乐天秋题牡丹丛》二十四则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绝，又有五言二绝句。……然则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

洪迈所举各诗尽管都出现了“牡丹”一词，

但洪迈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些诗都不是赞美牡丹的。在诗里,牡丹只是一个时间或事件背景,很多甚至还是专门对“重牡丹”之风提出批评。洪迈从唐人有牡丹诗推出唐人爱牡丹,显然没有说服力。

毫无疑问,在唐文士是否重牡丹这个问题上,欧阳修是对的。这点,从牡丹“发烧友”身份的特殊性上可得到证明:

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鞞,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圃则驻马而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库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白居易《牡丹芳》)

“侠少”和“豪家郎”都指那些出身豪贵、整日无所事事的青少年,都带贬义。他们赏花时的胯下物很独特,“矮马”“细马”。因其可以在果树下乘骑一般名果下马。又因其只有三尺左右高也叫矮马。此马原产高丽,最早大概是齐时被作为贡物进献。^①果下马产地不在中原,在唐代比较珍贵,李白诗之作为奢侈生活的一个象征,“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对酒》),元稹诗中也提到依凤翔舅族、与姨兄游乐时骑过矮马(元稹母系荥阳郑氏,家里有一定的势力)。矮马、果下马既然这样珍稀,说明能够骑到它的人一定身份不一般。

《唐律疏议》对驿站乘骑有严格规定,^②后来的规定更严格:“贞元中,禁未仕不得乘大马。”^③很多材料都有赶考书生骑驴的记载。由此可见至少在德宗的贞元年间未入仕者骑“大马”是犯法的。和“大”相对的只能是果下马。上述材料中矮马、细马的主人分别是“侠少”“豪门郎”。可见,他们具有出身显贵,尚未“入仕”的共性,所以,无资格骑大马,他们只有选择珍稀的矮马——果下马作为游春工具。这样既不触犯贞元法令,又把自己和一般寒酸的骑驴的读书人区别开来了。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李肇《唐国史补》卷中)

罗隐有诗题作《贵游》,指那些出身高贵、生活奢华之人。从中我们可见唐人对“贵游”的态度:

馆陶国外雨初晴,绣毂香车入凤城。八尺家僮三尺箠,何知高祖要苍生。

以高祖的关心民瘼、视民如伤谴责这些人的只知自己的享乐。显然,对“贵游”群体诗人是批判的。因此,可以说,中唐、主要是贞元时赏花的队伍,基本由这些出身豪贵、风流浮华、不关心百姓生活的王公大人及其子弟构成。

所以,对于“京城贵游尚牡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这样理解:贞元之世,确实有“尚牡丹”的风习,但那只是一定群体范围内的习俗。文士们显然独立于“流行”之外,观察、质疑甚至是批判。

至此,所谓“唐人尚牡丹”的面目才更清晰。

三、晚唐:“牡丹”上堆叠的多重社会文化心理

(一) 繁华追忆

当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过去,当所有的热闹、繁盛都成为烟云,在无可挽回的日渐衰败和绝望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回忆“过去的好时光”,会将曾经的繁盛涂抹上艳丽的霞彩,让它成为“一塌糊涂的泥潭里的光芒”。牡丹,作为代表着繁华、豪盛生活的符号,以其富丽堂皇之美、张扬恣肆之姿、鲜香馥郁之气,吸引着晚唐(包括五代)的文人不断地去回味、追思曾经的“好时光”。

舒元舆的《牡丹赋》中的牡丹就是曾经过去的那个富丽堂皇、繁花似锦的王朝的象征。他借牡丹这一物象表达了对繁盛的期待。后来文宗吟咏“向者如迎,背者如诀。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时的潸然泪下,伤怀的可能不单纯是一位大臣,可能还有“中兴”计划的彻底无望。开天盛世离晚唐人太远,境界太高,

① 见《太平御览》卷781《四夷部2》记载“武德四年,百济王扶余璋遣使来献果下马”。

② 《唐律疏议》卷十:“六品以下前官、散官、卫官、省司差使急速者给马使,回及余使并给驴。”如果给了该骑驴者骑了马,驿站负责人和当事人都会被治罪。

难以企及，而中唐则是一个可置于眉睫之前、操斧伐柯时最近的“取则”，于是便“尽觉秣华在牡丹”（齐己《湘中春兴》）。中唐时上层社会流行的牡丹热就成为了风流富足、繁盛的代表，成为了江河日下帝国的理想。晚唐，吟咏、赞美牡丹诗激增是此种心态逐渐浓郁的明证。如乾宁二年进士王贞白的《看天王院牡丹》：

前年帝里探春时，寺寺名花我尽知。今日长安已灰烬，忍随南国对芳枝。

多年以前，我过的是裘马轻狂的生活，追逐着花的开放，无忧无虑地享受着自然慨然赠与的美好繁盛。而此刻，那声色犬马的生活，连同追逐名花的兴致都随着唐末长安的“灰烬”一起“灰烬”。流寓到这偏远的南国，眼前那烂漫开放的花朵，灼痛我的双眼，更激起我对长安美好生活的伤怀。逝去的将永远逝去，昔日决不可能重现。除了追忆，除了伤心绝望，还能怎样呢？

与王贞白的伤心绝望相比较，唐末朝士的《睹野花思京师旧游》的情绪似乎要明朗一些：

曾过街西看牡丹，牡丹才谢便心阑。如今变作村园眼，鼓子花开也喜欢。

一样是今昔对比的手法，区别只在于王贞白对比后绝望，“唐末朝士”对比后随遇而安：过去是趣味高雅，只欣赏牡丹，其他花朵都不值得抬眼。而现在一枝小草花的开放都令他欣然。与王贞白的伤心绝望相比，“唐末朝士”的随遇而安其实有一层更深刻的绝望：前者以趣味的坚持来顽抗，而后者则是彻底缴械投降，心里还潜伏着隐约的忧虑：很可能哪一天，连这样微末的花朵都不再开放了。时代的动荡逼迫着人们不敢再放纵自己的趣味去追忆去怀想，他必须抓住那能抓住的任何一点幸福，否则它会如夕阳般沉入暗夜不再重来。这些追忆会不断添加新的意义于其上，最终使得牡丹成为一切美好的象征，如“万朵照初筵，狂游忆少年”（薛能《牡丹四首》）中的青春追忆。

总之，晚唐时，牡丹成为对富丽、繁华、雍容时代的追忆。文士在牡丹身上，寄托了他们对老大帝国的怀念、对风流飘逸日子哀悼、对青春、对如烟尘般散尽的一切美好的回忆。

（二）衰败、残破与冷寂：帝国风雨飘摇的

写照

“怕风惟怯雨，忧雨不经旬”（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牡丹花期短，惧怕风雨，唐人往往对牡丹百般呵护，或张帷盖，或设帘幕，但“数日帘常卷，中宵雨忽来”（刘昭禹《伤雨后牡丹》），牡丹还是经常花容憔悴。中唐时，从未有人写过残牡丹。但晚唐时，这类诗作突然多起来，“风促乍开方可惜，雨淋将谢可堪悲”（孙鲂《看牡丹二首》）。牡丹的衰败似乎特别能牵引晚唐人的目光，“更持红烛赏残花”（李商隐的《花下醉》）成为了晚唐牡丹诗的典型景象。“心见眼见”，残牡丹吸引不了中唐人的目光，而在晚唐特别受关注，个中缘由，不道自明。

南唐赵王李德诚子李建勋（873？-952）有数首诗写残牡丹，为他在诗坛留名的也是他为残牡丹摹形的诗句“失意婕妤妆渐薄，背身西子病难扶”。单纯从个人经历来看，李建勋是非常顺利的。他于南唐建国有功，拜相，仕途一直十分通达，致仕后依然过的是寄情山水、放意泉石的优裕生活。为什么他的眼里却遍是不可收拾的残破和怜惜呢？

携觞邀客绕朱阑，肠断残春送牡丹。风雨数来留不得，离披将谢忍重看。氛氲兰麝香初减，零落云霞色渐干。借问少年能几许，不许推酒厌杯盘。（《晚春送牡丹》）

写牡丹的零落，写诗人的不舍和眷恋，更写牡丹残败带来的人生思索：生命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少年时光是那样的短暂，人们只有在这尚能抓住的美好生活里沉醉。日薄西山，满目夕照转瞬就会被黑暗吞噬。但夕照毕竟还带有一抹彩色，能给人些许温暖。那么，就在这夕阳的霞彩里舞蹈吧。牡丹马上就会零落为泥，但是，此刻，她还在枝头，还是近在咫尺的富贵与华艳，我们还能在这华艳和富贵的气息中享受片刻的快乐时光。多好啊，多美啊！她正在一步步离去，渐行渐远，而且永远不会回来。那么，尽情欢乐吧，不去想接下来的日子有几多伤感、几多麻烦。此诗会把我们带进李建勋的凄艳中，对帝国风雨飘摇中的士人的心理会有更深切的体味。

李德裕的《牡丹赋》作于甘露事变后，衰败的气息很浓。文章的重心在“华艳恍惚，繁华遽

毕”后的失落。作家由此悟到:

勿谓淑美难久,但芳不留。彼妍华之阅世,非人寿之可俦。君不见龙骧闲阔,池台御沟,堂挹山林,峰连翠楼。有百岁之芳丛(原注:今京师精舍、甲第,犹有天宝中牡丹在),无昔日之通侯。岂暇当飞藿之时,始嗟零落;且欲同树萱之意,聊自忘忧。

短短的人生无法丈量长长的岁月,脆弱的生命难以和强健的自然抗衡,功名利禄的属性是转瞬即逝和虚幻漂浮。“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罗邺《牡丹》)。诗人罗邺看到此点,出色的政治家李德裕也异常清醒地知道这些。微妙的人世间能把握的东西实在太少,生命不胜承载的负荷实在太多。如此,唯一的选择就是麻木和忘却。仅此而已!

“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牡丹自然不可能如盛时的烂漫与纵恣。她与诗人们一道,吟唱着帝国的悲声。

(三) 社会批判

晚唐时,诗人寄寓在牡丹中的情绪是非常丰富的。赞美怀念之外,批判也是一重,如对浮荡豪奢、华而不实社会风气的批判:

烂熳香风引贵游,高僧移步亦迟留。可怜殿角长松色,不得王孙一举头。(翁承赞《万寿寺牡丹》)

朝日照开携酒看,暮风吹落绕栏收。诗书满架尘埃扑,尽日无人略举头。(徐夔《牡丹花二首》之二)

还有对牡丹本身品质的一些指责:

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曷若东园桃与李,果成无语自垂阴。(王睿《牡丹》)

青帝于君事分偏,秣堆浮艳倚朱门。虽然占得笙歌地,将甚酬他雨露恩。(唐彦谦

《牡丹》)

这些思想,是中唐社会批判精神的延续,只是从对“京城贵游尚牡丹”的社会风气扩展到了与牡丹有关的事物,从外在的社会批判深入到对牡丹本身品质的剖析。只是,和白居易的直切民瘼相比,这些批判多少显得有些轻飘飘的。当疗救已完全没有可能的时候,指出病苦是无意义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晚唐诗人于此浪费笔墨的不是很多。

四、余论

史蒂芬·欧文认为中国的诗歌“不像许多的中国文学史所讲的那样每半个世纪发生一次巨变,在一千多年前创作的诗歌里,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甚至可以用年和月度量”。^[6]世道人心、风物习俗、流行时尚、社会心理,等等都和诗歌一样在受着各种合力的影响,不断发生着种种或隐或显的变化,可能有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唐代牡丹玩赏这一个案提醒我们:第一,研究中使用泛称概念要特别谨慎,要尽量避免以偏概全;第二,对历史事实、心态等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接近历史真实;第三,身份决定视角和态度。社会地位的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必然迥异。

参考文献

- [1] 段成式. 酉阳杂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 李肇. 唐国史补:卷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7.
- [3] 王谔撰. 唐语林校正[M]. 周勋初, 校正.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628.
- [4] 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M]//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77.
- [5] 佚名. 大唐传载[M]//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884.
- [6] 史蒂芬·欧文. 韩愈和孟郊的诗歌[M]. 田欣欣, 译.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4:2.

Love of Peonies and Cultural-Psychology in the Tang Dynasty

FANG Li-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changed from time to time, as is reflected by the changing interest of the people in peonies. Firstly, not all people in the Tang are fond of peonies. During the Mid-Tang period, most people addicted to peony are rich people or privileged people, and peony is the tool they use to show their possessio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peonies became popular. Secondly, the meaning of peony in the literary works has changed. During the Mid-Tang, literati maintain a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the fondness of peonies. Along with the fall of the dynasty, the emotion of the literati became complicated. Peony became a symbol of decline and desolation in literati's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peony; the Mid-Tang Dynasty; the Later Tang Dynasty; cultural psychology;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责任编辑 王 抒)

(上接第 16 页)

[16] 朱永生. 语境动态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9.

ANTI A, GODWIN CH. Rethinking Context. Cambridge: CUP, 1992: 229-252.

[17] GUMPERZ J. Contextualization and Understanding[C]// DUR-

[18] 徐盛桓. 关联原则与优化思维[J]. 外国语, 2002(3): 2-10

Relevance The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ing Paradigm of Context

YOU Yu-xiang^{1,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Jiaying University, Jiaying 314001,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Relevance theory redefines the concept of context epistemolog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The contribution of relevance theory to the study of context is that it embodies the shift of context studies from static study to dynamic study, from objective analysis to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from description to interpretation and thus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ing paradigm of the context.

Keywords: relevance theory; context; researching paradigm; evolution

(责任编辑 王 抒)